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李治亭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 100080)



摘要: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关键词:土司学;土司制度;独特性;东北卫所制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7)04-0013-06

作者简介: 李治亭,男,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引用本文: 李治亭.论“土司学”的独特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4):13-18.

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史学大发展,空前繁荣。其中,在西南地区学术界不断掀起土司研究的热潮,就是史学界盛况的生动写照。

土司研究热潮集中表现在:研究成果累累,资料整理丰厚,全国性及地区性土司研讨会频频举办,进而成立了全国性的土司研究学术团体,更有三处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有力推动了土司研究在深度、广度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土司研究真正成为了史学研究领域中一门“显学”。构建“土司学”可谓是水到渠成。

既然要构建“土司学”,就要论证“土司学”的内涵、理论指导及研究方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已有专家学者论及。本文则主要阐明“土司学”的独特性,以与其他任何一门学术区别开来,以见证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价值。

一、“土司学”是土司研究的必然产物

我国的史学史证明:任何一门学术的产生,都是其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藏学、满学、蒙古学、敦煌学,以及文艺界的“红学”等等,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学术发展、演变,以及学术的积淀后,最终定型为一门专业学术。除“红学”,前几种“学”已被外国学术界所公认,已成为具有世界或国际意义的学术。当然,土司学也不例外,它同样是在遵循着前者的方式在发展、演进。

土司研究,改革开放前已有60年的研究历程,其研究成果如何评价,姑置不论。以改革开放为发

端的近40年中,土司研究从少数人到整个西南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举凡史学专业的大多数学者都投入到土司研究;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主要学术地区;从一个长期默默无闻、不被关注的学术问题,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一门主体学术,且备受地方政府及众多文化部门的关注;从一个无组织的学术群体,发展成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团体,同时形成了以吉首大学、长江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为代表的多个土司研究的学术重镇。自2011年召开首届国际土司学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召开过六届。如此高频率地举办大规模的专业学术研讨会,这在其他专业学术领域还不曾有过。土司学术的影响已从西南、西北地区转向全国,同时正在走向国际。

再看科研成果。一看数量,积30余年,特别是近10余年的研究成果,确已形成规模,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二看质量,可以说,研究水平步步高,既有理论深度,也有涉猎的学术领域呈日趋扩大之势^①,使土司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

回顾土司研究历程,也是土司学形成的历程。它与藏学、蒙古学、满学的形成大体相类,共同走过了相似的发展之路。特别是满学,与土司学之形成有着几近相同的学术经历。在改革开放前,无论史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都没有满族研究的地位,研究满族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屈指可数,其成果也是少得可怜,甚至不如土司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满族历史文化迅速成为清史、民族史研究的热点,并上升为一门“显学”。满族史研究之盛况为其他民族史研究所不及。由此也吸引了欧美日学者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对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于是,“满学”作为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遂告成立。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某些被定名什么“学”的学术却是半途而废。“避暑山庄学”的起落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避暑山庄的研究热潮,遂有学者倡名“避暑山庄学”,仅得到清史学术界有限的响应。不过热闹了十几年,便悄无声息了,至今,已无人再提起“避暑山庄学”。还有,已倡名十余年的“故宫学”,时至今日,仍是“和者盖寡”。

实践证明,一门学术何以兴,何以兴不起来,何以兴而衰,并非是学者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这取决于一门学术自身的条件。例如,构成一门独特学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就是说,它涵盖的地区(地理)有多大?内中有多少百姓群众或民族参与其中。如上面指出的“避暑山庄学”与“故宫学”,其所涵盖不过是一庄一宫,而且都是以皇宫为首的达官贵人们的政治活动的场所,与芸芸众生的社会隔绝,根本没有一个普通民众参与其中,这就失去了称“学”的社会性,也就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原因还有,对一庄一宫之学,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说得明白些,没有被学界更多学者所认可,所接受。显然,既缺乏学术界的共同认知基础,又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广泛性,任何一门学术也是立不起来的。

比较之下,土司学所涵盖地区,有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地理空间之广,比藏学所含之藏、川、青,蒙古学所属之内蒙,满族所在之东北三省,都更为广阔。其中,涉及的民族之多,人口之众,也大大超过藏学、蒙古学和满学所辖之范围,更是远远胜过一庄一宫之学。

以时间论,土司制度兴于元,盛于明,延续至清末,历三个朝代,部分土司还续传至民国,长达600余年。如一庄一宫,前者仅历200年,后者历明清,也有500余年,其历时虽久,不过是孤立的一组宫殿群,与土司所覆盖的地区不可相比。

土司学的形成,与满学研究走过了相近或相同的学术演变之路。由土司的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发展到全国性的研究,由地方学者研究发展到全国学者的投入,由单一学科(如史学)的研究发展到多学科的共同参与。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它的独特的研究体系,成为一门专业研究领域,也就使“土司学”应运而生。

二、“土司学”独特的学术内涵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与其他门类的学术相区别的学术内涵,这就是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如,藏学、满学、蒙古学以及敦煌学等等,各有独特的学术内涵。

(一)“土司学”的学术内涵

首先我们要阐述的是,“土司学”的内涵是什么呢?所谓“内涵”,当包括土司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指导及其核心价值等。可以肯定,内涵的方方面面都是土司学所独有的,当然会有个别方面,可与其他门类的学术相同,如应

^① 关于近年土司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可详见李良品、廖桂玲《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发展报告(2015)》,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页。本文以此为据,做一简单评估。具体不赘。

用马列主义为指导,即应为各学科学术研究所以通用。

积40年土司研究之实践,我们知道,土司研究既不是一朝一代的断代史,亦非哪个朝代中的一个专题专项研究,而是从王朝断代史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一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也就决定了土司学研究的对象与具体内容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给土司学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

近年来,西南地区的学者们不断深入研讨,纷纷论述有关土司学的定义、内涵问题。有学者说:土司学是研究“土司或土司活动”、“土司现象或土司形态”、“土司文化”的一门学问,即“是研究土司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1];还有的说:“土司学是研究中国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还有类似的说法,如说:“土司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土司相关问题的学问。”^①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说法种种,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阐明土司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具体说,土司学到底研究什么?也就是研究对象不清楚。如第一种说“土司或土司活动”、“土司现象”、“土司形态”、“土司文化”,等等,显然,并没有回答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果认为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中国政治、宗教……的“综合性学科”,那不如说是在讲中国通史,哪里还有土司学研究的独特性!

要认识土司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土司学研究对象,即与其他学术领域不同的独特性。土司学的独特性,就在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可以说,没有独特的土司制度,也就没有了土司学的独特性。考察历史,土司制度源起唐宋以来的羁縻之制,至元代,始定为土司(时称土官)之制。清代大学者毛奇龄指出:“自古无土司之名。”^[2]的确如此。至明中叶,始有“土司之名”。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元在西南“蛮夷”地区分设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五司名号,以当地部落酋长或世家大族任之,以此确立中央在这一广大的民族地区的管理体制。对这些名号的称呼,自然以官方所定名号称之,尚无简称或直呼为“土司”者。明承袭元制,在西南民族地区,以上列五司名号为土司专称。行之已久,约定俗成,渐以“土司”称之。可以确认,“土司”是对上列五司的统称、泛称,也是简称。五司加一“土”字,如同“土官”“土民”“土贡”“土兵”

“土人”之意,举凡当地之人之物之官,皆属本地产出,所谓“土”,即是土生土长之意。以上所议,不过是顺便说到。因为在土司研究中,有关土司之名的源起颇多议论,理解不同,歧义难免。

其实,名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元明清所行土司制度如何解读,而且,此制在运行过程中有无变化?更要看到的是,土司制度何以跟中央王朝不时发生矛盾,以致引发规模不等的武装冲突。由此进一步考察土司制度是否存在弊端?或者说,这一制度是不是有不可克服的缺陷?

研究土司的历史,实际是研究土司制度确立、发展、演变、废除的历史,从而认识600年的土司制度的兴衰过程。

上述所列出的问题,仅仅是土司学研究的部分问题,进而还要继续研究土司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制度。研究这个问题,是要了解中央王朝创设此制的目的,以及用以管理或统治西南诸“蛮夷”的方式和手段。同时,要研究中央王朝与土司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双方不断出现的矛盾。这是就土司制度的外部问题而言的。那么,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所辖地区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需要研究解决的。诸如社会结构如何划分,阶级关系如何,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内部社会财产如何分配,法律如何规定,有无礼仪的具体规定,以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如何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在土司统治时期,各土司的辖境内,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与民族为一体的共同体。这也正是土司制度的特点。例如,每个土司的辖地是明确的,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汉民族所居之地疆界历来是明确的,土司与辖区内土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泾渭分明,毫不含混。土司无疑是这一辖区的最高统治者,生杀予夺之权全在土司之手。不仅如此,在其辖境内的一切土地、山河、一草一木,皆属土司。在这些方面,大多沿袭土司制度前的旧俗,以及不成文的习惯法。土司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世袭制,土司职衔可由子子孙孙世代传承,如同中央王朝皇位继承制,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各土司世掌其土、世管其民,俨然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一句话,在土司治下,实行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土民往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②。在土司统治地区,一般而言,

① 引自“中国土司学高层论坛”会议(吉首大学,2016年10月)发言。

② 有关土司残暴统治、土司受残害之状,史籍多有记载,可参见(清)蓝鼎元《边省苗蛮事宜论》,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当代学者李世瑜《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有详细论证。

其内部社会制度与农奴制相类,也有少数地方,又与奴隶制无别(如四川大小凉山的土司)。

土司的对外关系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是土司与土司之间关系。这一关系相当复杂,除中央政府、地方长官的利用、分化因素外,各土司之间既有世代联姻、和平相处者,也有争土仇杀,引发为战争者。二是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二者之间显然是一种主从关系,即土司承认中央王朝为它的最高统治者,中央王朝也承认土司在当地的统治者身份。这也是一种双方的相互认同。每当新土司承袭,必得中央王朝的授封,始获合法继承权,在其后的岁月里,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听征调,上下相安,关系稳定。如果土司危害地方,不听中央王朝指令,致使双方的主从关系破裂,战争便不可避免。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土司(宣慰使)杨应龙为乱,明廷出动大军20余万征剿,激战近一年,明军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至次年六月,将杨氏土司消灭^[3]。这一事件使明朝廷和播州土司两败俱伤,可谓教训深刻。除播州土司外,在明清时还有“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利而后铲平之。故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4]。显然,在数百年的土司统治时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治乱兴衰,土司是关键。可见,研究明清时期西南诸省之历史,土司研究之重要,是无可替代的。

以上,不过是简述土司制度之大略,因本文并非专门讨论土司制度,只是要说明土司制度是长达600年间,元明清三朝统治者统治或管理西南地区的一项特殊的、然而又是适应当地环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而其内涵之丰富,从以上之大略可见一斑。

(二)土司制度的独特性

土司学的独特性,取决于土司制度的独特性。土司制度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司制度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行省内与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同时并存,二者之差别不言自明,故有学者称之为“双轨制”,而且土司制度的确立,创建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5]。二是土司(土官)虽然纳入中央王朝的职官管理体系,属于朝廷命官,但与遍及全国的地方官及中央官又是完全不同的,世袭制度是土司的显著标志,其他如朝贡、征调等条例也只是为土司制定的。可以说,土司完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官。这些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不赘述。但是对于土司制度与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或者管理制度,如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地区的伯克制,有人就看不到

它们的区别了,甚至将它们也纳入土司制度之内,以至造成土司研究的泛化。其实,这正是忽视了土司制度独特性的表现。只要将土司制度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制度稍加比较,便可看出土司制度的独特性,如果深入探讨两者的社会生活,其差异之大,立显无疑。

拿明代东北实行的卫所制与土司制度比较是有所意义的。明在东北不设行省,而以卫所制辖之。其中,辽东部分即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境,为华夏—汉人聚居地,设都司、卫、所统辖,派流官、驻防兵,比同内地。自开原(今辽宁省开原)以北,包括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广大地区,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女真与少量蒙古人的繁衍生息地。自明永乐初,至万历年间,约计200年中,广设卫所,共384卫、24所、7个地区、7个站、1个寨,总辖于奴儿干都司。明廷“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以时朝贡”(《大明一统志》卷89,“女直”)。简言之,明朝将相应官衔赐给各部族的酋长,让他们按习俗自行管理。将官职分赏给当地酋长,就此而言,无论土司还是卫所,做法上并无差异。但二者最根本的不同是,土司是世代承袭的,如著名的播州杨氏土司,至杨应龙被杀改流,已历28代,如从元代纳入土司制度,其承袭也近20代。其他各地土司同样都是世代承袭。这种情况,在上列的女真人聚居之地所行之卫所制,却不是承袭,如奴儿干都司为所辖卫所总指挥机构,其都指挥使等官均为“流官”,明定制:“凡流官不袭”(《明会典》卷120《銓选三》)。也有因功允其子袭父职的,不过这只是个案,破例封赏而已。

此外,土司都有固定的辖区。土司统治的地区,既是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也是朝廷认可的。尽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划界,但其管理的区域还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土司及其所属土民世代聚居于一地,具有长久的稳定性。但在卫所管制下的女真社会,却并不稳定地居于一地,而是经常迁徙,居地之变动已是常事。如努尔哈赤的祖先本居于黑龙江地区,却携族人南迁,进入今朝鲜北部,住了多年,又回迁至中国境内,辗转才落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境。至于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生产力低下,以狩猎为生,其生活地尤其不稳定,更是迁徙不断。他们分散而难聚,无法像土司那样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诸如管理机构、法律、监狱、税收、军队,乃至礼仪规则,在这里都不存在,一切按古老习俗生活。比之土司,这里的社会还处于低级阶段。这些数以百计的卫所与明中央政府的关系,远不及

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紧密，表现得松散而无序，例如朝贡，在这里并不视为重要问题，似乎是顺其自然，可有可无。好多卫所偶尔朝贡一次，下次在何年，就不能确定了。而在土司地区则完全不同，朝贡与否，成为判明土司对中央朝廷忠诚与否的重要标准。明代对土司朝贡有严格的规定，而《明实录》中对各地土司的朝贡，乃至朝廷赏赐的记载，不胜枚举。这是东北卫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以进行比较的方面，还不只这些，但足以表明，土司与卫所不可同日而语。土司制度更显出它的独特性，这也反映出土司学的独特性。土司制度内涵极为丰富且呈多样性，无疑为土司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一种学术内涵贫乏而单一，且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无论如何，这门学术难以成立。这是以土司制与同时代东北地区所行卫所制相比较，自然就得到这一结论。如果把土司制度与盟旗制度进行比较，同样是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盟旗制度下，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不存在如土司内部所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其“社会”也在游动之中，没有土司社会下那种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国现存土司遗址（包括衙署、城堡、庄园、墓葬等）有上百处，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三处，即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十余处，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十处。至于土司地区的官署建筑、碑刻匾额、雕塑印章、谱牒家传等，更反映了土司制度的独特魅力，也是上述地区无法比拟的。由此，更显出土司制度——土司学内涵的丰富与厚重。

最后，还要提到土司文化，包括民族传承的文化、地域文化，更是卫所制、盟旗制所不能比拟的。云南、广西等地区至今是最稳定的民族地区，这与土司地区的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关系。文化自然是土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文化的积累至厚、特色浓郁，成为支撑土司学的一个重要支柱。

概括以上，土司学研究的基础是土司制度的兴盛衰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所涵盖的所有内容，就构成了土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具有独特的学术内涵，厚重而丰富的历史，多姿多彩的特色文化，土司学可以郑重宣告成立，另立为一新的学术领域。

三、“土司学”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门学术，必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认识

价值、实践价值。这三个价值相互联系，相互涵摄，不一定非以“三价值”而评定，有的学术具有重要的理论、认识价值，未必能实际应用。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具备了一定价值，才成为一门学问。反之，没有多少价值的学术，是不能称其为“学”的。换言之，学术价值论是构成一门学问的必要条件。土司学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门学问，其独特的重要价值，是其独特学术存在的基础之一。

那么，土司学的当代价值有哪些呢？毫无疑问，它的价值就存在于它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我们要从中去发现，进而提升为某种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土司制度的历史再做一番考察。

从理论认识上说，土司制度的顶层设计仍然是贯彻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是唐宋以来所行羁縻之制的延续，又有所发展。但这一制度的设计并不完善，还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元代时，对西南“蛮夷”之治，“设官牧民，随俗而治”（《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明因袭不变。入清，仍一如旧制，其“土官以世系承袭，不由选举……”，举凡国家对官员的定期考核、惩处，土司都不参与，其“不肖者无惩，间有一二贤者亦无以示劝，欲其奉职守法也得乎？”（《云南通志》卷29，“艺文”，“蔡毓荣：《筹边第二疏》”）这是说，土司既不受国法约束，亦不受官员规则所左右，犯了罪，不予惩处，怎能设想土司们会奉职守法呢！所以朝廷对土司“莫可如何，以致骄纵滋蔓，尾大不掉”。土司为非作歹，“玩法纪若罔闻者，故曰其为恶最深也。”（《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十七·蛮防上》）很清楚，土司归属朝廷，只是一个名分，如前已指出，每个土司皆自行其是，实为一独立王国，对中央王朝来说，形同割据。如清之学者戴名世一针见血指斥土司制度，“名为羁縻”，实为“天地间之缺陷”^[6]。土司制度之弊端，毕露无遗。

中央王朝对土司管理体制的设计，实则是华夷之辨民族观念的产物。中央王朝把土司及其管辖的广大部民隔离在中央直接管理体制之外，放任自流，自行其是，只要一个虚名，定期朝贡而已。如上所引史实证明，土司实力膨胀，必与中央发生矛盾，乃至形成军事对抗。如明，在西南土司地区战事不断发生，经常造成地方动乱，国家难以安定。

土司制度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制度初创，往往运行正常，显示出比以往制度的某些优越。但是，利久弊生，一项制度用久了，到了新的时期，遇到变化的形势，其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如能因时而革，及时修订，方不致出乱子。如不知变革，土司制度就变为西南地区的致乱隐患。至清雍正初，土司

制度的弊端在新形势下充分暴露,清政府果断实行改土归流,才使西南地区重获生机。

从土司制度之兴,经其兴隆后,走向衰落,终于被废除,这恰恰是土司制度兴亡的过程。总结这一过程,使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永久不变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应民心的要求(如湖广土司属下的广大土民强烈要求废土司,清政府顺民意,把土司改流),社会才会向前发展。废旧制,必用设计好的新制取而代之。关键是,新的制度必以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去设计。土司制度的最初设计就不完善,尤其是民族观落后,这是不可能行之持久的。

西南地区土司与中央的关系,如前已指明,两者是政治上主从关系,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内地,由中央政府直管的地方各级官吏,无不听命于朝廷,特别是皇帝的指令,哪敢有丝毫的抗违之意?所以,上下协调一政,一般不存在任何问题。土司则不然,若不符合其利益,或视朝廷衰弱,便抗违而不遵,冲突或战争很容易爆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地方上的土司如何处理好与朝廷的关系?土司制度给我们的启发是:地方服从中央,是绝对必要的,如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引发内乱,乃至大规模战争。从明至清初,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无数次,多为土司所造成。在这方面,土司制度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元兴土司制,明承袭,一个问题是,两代王朝对其边疆的土司地区,并未实行与内地同等的一体化政策,对其所属的经济、文化发展,任其自行生长,

特别是广大土民受土司之害,有如水深火热,形同地狱。不少史籍大量记述土民的悲惨生活、极惨的命运。但中央王朝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特别是地方官,对土司辖地的土民不视为“同在中华之内”,如有“流官”称:“此土人非我百姓”,故“漠视”不理;至于当地“科派之中,刻虐之惨,则惟土官司之”,朝廷派来的流官也不予过问(见《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十七·蛮防上》)。这种状况,世代相继,以至土司地区发展缓慢,与内地相比,不知要落后多少年。彼此隔绝,亦生离心倾向,与中央朝廷保持距离,倘若产生矛盾,不易化解,遂生出种种不测事件。

从土司看边疆,必得适宜的行政管理体制,行之有效;必须坚持国家大一统,防止割据、分裂;必实行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同步发展。这应该是土司研究,亦即土司学的基本价值观。应用其价值观,指导当今边疆治理,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引用文献:

- [1] 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 [2] 毛奇龄.蛮司合志[M].台北:广文书局,1968.
- [3] 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
- [4] 清史稿:卷512[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 李世愉.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
- [6]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M].上海:上海文瑞楼,民国七年(1918年).

(责任编辑:陈伟)

On the Uniqueness of the Study of Tusi

LI Zhiting

(Stat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Every specialized research fiel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uniqueness. Without it, it could not be called a study.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Tusi is not only due to its long research on Tusi, but also its unique academic connotation, which i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que history of Tusi System. Since the Yuan Dynasty (1206—1368), the Tusi system has been an important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southwestern China,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local governance,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research the history in southwestern China without it. The uniqueness of Tusi system represents a new model of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The regulations of inheritance, tribute payment and requisition of a Tusi, as a local official,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n official sen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o is not inheritable. As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frontier regions, Tusi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ystems of frontier regions, such as those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and in Mongolia and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1316—1912). Many Tusi sites and Tusi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show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usi system and Tusi culture.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the uniqueness of the study of Tusi without the unique Tusi system.

Key words: the study of Tusi; Tusi system; uniqueness; “Weisuo” system in northeastern China (a military system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